



七日談

(澳門篇)

全新詮釋當代中國實踐

——巴西出版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詞典》的文化深意

吳志良

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零五年前夕，英國駐華大使魏磊（Peter Wilson）應中聯部邀請，參訪陝西延安（延安革命紀念館、楊家嶺革命舊址及延川縣梁家河村），成為中共二十大以來首位訪問「紅色聖地」的西方大國駐華大使。

今日世界，正值國際秩序劇烈震盪之際。特朗普再度執政以來，美國對外政策急劇轉向，俄烏衝突延宕未絕，歐洲大陸瀰漫着焦慮氣息，委內瑞拉總統被入境強行帶走，伊朗被戰火蹂躪，戰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形同虛設。當西方陷入制度性疲憊之時，歐洲思想界卻悄然開啟了一場沉默而深刻的轉向——越來越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開始帶着真正的好奇重讀中國經典、重審中國實踐，追問一個根本問題：如果第一次啟蒙是西方的獨白，那麼第二次啟蒙能否成為文明的對白？

正是在這一歷史關口，由巴西出版的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詞典》問世了。這部辭典匯集多位國際學者，系統梳理了中國革命至今的政治、經濟與歷史詞彙，旨在讓葡語世界的讀者深入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脈絡。在早些年，出版這種書是不可想像的事情。時至今日，這並非孤立的出版事件，而是全球南方國家尋求新的文明坐標的一個生動縮影，代表了一種趨勢的轉向。

西方現代性的反思與文化需求

西方現代性所依託的理性至上、個體絕對自主、主客二元對立的哲學預設，在今天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質疑。哈佛大學漢金斯教授在對比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與儒家傳統時發現，兩者都曾深刻關注「有德者治天下」的命題，只是西方在十七世紀後逐漸轉向憲制、權利與契約，將「揚善」擱置，專注「懲惡」；而中國則通過科舉制度將賢能政治延續為可操作的制度實踐。這一差異背後，其實隱藏着一個根本性的問題：西方是否在告別美德政治的道路上走得太遠？

與此同時，全球治理體系正經歷深刻的「禮崩樂壞」——大國繞開安理會單邊動武，貿易協定被國內政治隨意推翻。北美哲學家南樂山畢生致力於將儒家從「地域性倫理」提升為「普適性哲學」，指出當代文明衝突的根源之一是缺乏能容納文化差異的「全球儀式」。這本詞典恰恰回應了這種知識渴求：它不是中國理念的單向輸出，而是對全球性精神需求的文化應答。

澳門作為文明對話的「活態實驗室」

澳門五百年來作為東西文化交匯之地，形成了「禮失求諸野」的文明共生經驗，早已成為「東學西傳」的活態實驗室。這本詞典能在巴西順利出版，除了巴西作為葡語世界最大國家的體量和影響力外，與澳門這座

「文化驛站」的橋樑作用密不可分。詞典的合著者之一 Ana Maria Sal-danha，曾是澳門高校的教授，目前在湖南師範大學任教，為該書貢獻了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詞條。

中國和巴西都是發展中國家，也是土地面積和人口規模超大的國家，兩國之間有很多共同點，也有很大的發展合作潛力。作為葡語國家共同體的觀察員，澳門這一獨特平台——它既熟悉西方話語體系，又能準確傳達中國發展的深層邏輯，恰好填補了西方知識界在理解中國時所面臨的「盲區」，應該更好地承載這一宏大使命。

海外學者講述「中國故事」的文化意義

一九七九年中葡建交後，澳門在推動葡語國家與中國的文化交流中承擔了特殊使命。中國與巴西已於二〇二五年五月宣布將二〇二六年設為「中巴文化年」，兩國元首強調要加強文明交流互鑒，為促進和平、安全和可持續發展作出積極貢獻。在此背景下，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詞典》的出版提供了一種知識層面的深度對話。

書中收錄了有關粵港澳大灣區的詞條，詳細介紹了這一「經常被比作矽谷」的經濟科技區域的發展戰略，這對於正在尋求自身發展路徑的巴西無疑具有重要參考價值。通過學術話語而非單純的政治宣傳，詞典為



◀六月二十六日，在巴西里約熱內盧，觀衆在「和鼎調羹——中國古代飲食文化展」媒體活動上參觀。

中國的發展道路提供了理理解讀的切入點。

出版的戰略眼光與深層用意

巴西之所以選擇出版這樣一部辭典，還有着更為深層的地緣政治考量。巴西作為金磚國家成員和「全球南方」的重要力量，在西方主導的全球敘事體系中同樣長期面臨話語權不足的困境。中國的現代化經驗——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成功消除了絕對貧困——為巴西等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種有別於西方模式的發展參照。詞典對「生態文明」「數字主權」「人工智能」等當代議題的納入，恰好回應了巴西在自身發展中面臨的現實挑戰。

更為重要的是，這部詞典填補

了葡語世界系統理解中國的學術空白，為巴西乃至所有葡語國家的學術界、政策制定者和普通讀者提供了認識當代中國價值及其發展理論、制度和道路的一把鑰匙，使中巴交流從單純的經貿往來上升到知識構建和文明互鑒的新高度。

站在二〇二六年「中巴文化年」的門檻上，我們有理由相信，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詞典》的出版不僅是一本書的誕生，更是一種文明對話的序章。它既是西方的獨白走向文明間對白的知識橋樑，也是澳門作為「中葡平台」價值的最新彰顯——當世界迫切需要一種容得下差異的「全球儀式」時，來自東方的智慧或許正提供一條可行路徑。

春山行



農曆二月二龍抬頭，俗云「龍抬首，萬物甦」。我循常年舊習，獨赴近郊春山。料峭餘寒猶繞林麓，而草木早已暗遞春信，此番與青山草木相逢，於枯榮起落間窺生命本貌，竟成參悟人世哲思的一程清修。

循舊年蹤跡緩步深入，昔年馥郁滿枝的小白花樹遙遙在望。去年今朝，細碎四瓣素白小花攢作繁星，暗香漫山；今歲初訪，枝頭僅有零星小白花初綻，俯身輕嗅，清芬幽遠，洗盡塵俗煩憂，心神豁然清明。凝神細觀，方覺造物藏盡玄妙：去年盛放過後的殘花枯褐蜷曲，仍依依棲於枝桠，不肯驟然零落；枯萼之下，新蕾早已爭先顯露，粒粒青嫩花芽細若塵沙，錯落綴於翠葉之間。東風拂枝，樹影輕搖，似有溫軟私語落於耳畔：待繁花滿梢，盼君重赴春約。

風捲殘瓣簌簌飄落，枯花與新蕾相映，林間雀鳴清越婉轉，聲聲入耳。《菜根譚》有言：「寵辱不驚，閒看庭前花開花落；去留無意，漫隨天外雲捲雲舒。」花葉一枯一榮，本是天地恆定法則，亦為人間尋常道理。舊歲凋零不必是終結，新生抽芽自有時序，萬物更迭，循環往復，不必為逝去耿耿，亦不必為新生惶惑。

側畔無憂花樹，更藏點破塵心的深意。一樹橙紅繁花盡數昂首向陽，舒展盛放；修長翠葉卻齊齊垂下，一仰一垂，姿態別致，初見便心有觸動，今日重觀，方解其中真意。東坡先生曾言：「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」無憂花葉，恰是人生通透之境：繁花抬首，是心向光明，常懷熱忱期許；長葉垂下，是放下俗世瑣碎煩擾，拋卻心頭累贅。花葉各行其道，互不牽絆，恰似處世智慧：心中長存向陽熱忱，身上學會卸下負累，方能不被雜念桎梏，活得從容澄澈。

行至山徑將盡，林間喜鵲啼聲連連，清音繞台。我靜立林間，默然祈願歲歲安瀾、萬事順遂。聲聲雀鳴，宛若青山溫柔應答，平凡期許，也因自然相伴多了篤定暖意。

三句之後，一個晴曉，晨光穿窗，我悠然起身，再度踏上山徑。遠觀昔日白花樹，已是繁花滿枝，簇簇串宛若桂子，濃香漫溢山野，沁透五臟六腑。朝陽穿林，投下斑駁碎影，我緩步林間，沐暖陽、嗅花香，緩舒肢體，吐納山間清氣。古人講求春日踏青養身，所謂「春補」，從非膏粱珍饈，而是置身山水，攬春光、納清氣，舒展形骸，沉澱浮躁心境，與天地相息，方是養心良方。

移步不遠處的檸檬果樹，前年秋實落滿地，此刻枝頭尚無青果，只層層新芽破枝而出，靜默蓄力向上。《道德經》云：「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九層之台，起於累土。」生命從無瞬時的盛大驚艷，所有驚艷盛放，皆源於默默扎根、穩步生長的長久堅守；於浮沉俗世中放下紛擾，始終向陽而立，方是長久的生命底色。

此番再度春山漫遊，遍歷草木枯榮，終勘破生命本真。不必執著過往凋零的遺憾，不必憂懼來日未知的前路。如山間素白小花，順應枯榮時序，永遠保有向上生長的本心；如橙紅無憂花，縱有俗世紛擾，亦始終昂首朝向天光。

《中庸》有云：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。」草木榮枯、花葉俯仰，皆是天地大道。若能順應時序、放下執念、心向光明，縱使歲月流轉，亦能守住內心安寧，擁得精神豐盈。



費彝民一九〇八年生於上海，祖籍江蘇吳縣，是民國著名導演、編劇費穆的胞弟，費穆為中國電影的先驅與宗師（有《香雪海》《生死恨》《小城之春》等作品）。費彝民一九二五年從北京高等法文學堂畢業，由於成績優異，獲得法國政府獎學金，被保送至法國高等電機工程學院，由於「五卅慘案」，他主動棄學，擔任北京隴海鐵路總公所文員，結識此時正任隴海鐵路會辦的張季鸞。一九三〇年起，他開始為《大公報》撰寫新聞和通訊稿件。

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，《大公報》發行一萬號紀念特刊，費彝民撰寫的《談大公報的使命》在顯著位置發表。他提出一個觀點，認為對於部分讀者而言，《大公報》是一個廣義的函授學校，主筆便是老師，報紙便是課本。所以《大公報》在傳達新聞、領導輿論之外，還應添上訓導社會的使命。在那樣一個新式教育剛剛起步，教學設施極不完備的年代，由私營的報紙擔當教化國民的重任，實在是遠見卓識。此文在報社內部反響很大，吳鼎昌、胡政之和張季鸞十分重視，認為其文切合實際，目光遠大。此文對於「九一八事變」後《大公報》設立明恥教戰的主張有直接的影響。

一九三六年《大公報》上海版創刊後，費彝民調至滬館，採訪新聞撰寫社評才具卓絕。滬版停刊後，留滬的費彝民等人一邊保管《大公報》在滬資產，一邊加入《文匯報》，費彝民擔任主筆。在孤島時期的上海，費彝民曾為國民政府做過秘密的情報工作，被抓進日本佔領軍監獄拷掠逼訊，至死不屈，戰後他獲得國民政府頒發的勝利勳章。

一九四五年費彝民以《大公報》特派員身份赴台北報道日本投降典禮，並發表《台灣巡行》等報道，對於國民黨的台灣接收大員多有批評。他的妻子蘇務滋說，「費彝民的台灣之行寫了一組很轟動的報道。應該說，那是一組感人肺腑的人間寫實，也是台



◀費彝民。

灣回歸祖國的歷史見證。」

一九四六年春，費彝民應邀重回《大公報》，擔任上海《大公報》副經理，負責經營和財務工作，亦撰寫言論社評。一九四七年費彝民與中國新聞界訪問團一行六人，在訪美期間與杜魯門總統會面。

一九四八年，胡政之率費彝民、李俠文等骨幹力量遷往香港復刊《大公報》，胡政之稱其為「最後的奮鬥」。行前的編務會上他說，「我已經是六十歲的人了，這次香港復刊恐怕是我對事業的最後開創。」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，香港《大公報》正式復刊，復刊號報頭下印有第一萬五千九百三十四號、督印人費彝民等字樣。費彝民被任命為港館經理，李俠文為編輯主任。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後，費彝民兼任上海《大公報》經理。

一九五二年，香港《大公報》改組。費彝民出任社長，此後一直主持香港《大公報》直至去世。一九五四年費彝民作為團長率領港澳國慶觀光團赴京參加國慶典禮，一九五六年他擔任政協全國委員會特邀委員。那個特殊年代裏，《大公報》是向國際社會介紹新中國的輿論窗口，費彝民更是溝通內地與國際之間的「超級聯繫人」，比如華人

女作家韓素音被費彝民勸說回國參訪。

費彝民說，「以我個人而言，過去六十年先後受季鸞、政之兩位前輩的訓導：張公教我如何做記者、愛祖國，胡公教我如何辦報紙、管全局。全國解放後，又蒙周恩來總理教我如何為國家辦事，為人民服務。這樣的際遇，不僅是個人的榮幸，我想也是青年人今天所應該嚮往的途徑。」

據費彝民回憶，周恩來接見他有五十多次，「總理說，我們肯定大公報三點：一、大公報是一貫愛國的；二、你們是堅決抗日的；三、你們培養了不少有用的新聞人才，並為黨和國家所用。」

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四日《大公報》出版第三萬號時，頭版發表了社長費彝民所寫《一萬號到三萬號》，追述了六十年來續辦《大公報》的經歷，堪稱一部《大公報》簡史，也是費彝民個人的簡歷。因推動中法友誼和對於新聞事業的貢獻，一九八二年費彝民獲法國政府授予榮譽騎士勳章。

一九八二年初夏，鄧小平會見香港《大公報》社長費彝民，首次提出了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，但保持香港穩定，繼續發揮自由港作用的想法，提出解決香港問題著名的八字方針：「恢復主權，保持繁榮」。《大公報》隨即報道此事，引起港人關注，香港回歸開始提上議事日程。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英草簽了聯合聲明，開始香港的過渡期。一九八五年六月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，費彝民任副主任委員。香港首任行政官董建華在《大公報》百年社慶時曾說，「香港回歸祖國，《大公報》扮演了重要而難以取代的角色。」

一九八八年五月費彝民去世後，愛國人士馬萬祺賦詩以為悼念，也是對其畢生功業的概括：「畢生心血獻大公，無畏無私慎始終。愛國堅貞經考驗，同心同德盼大同。新聞事業尊榮譽，文化交流眾推崇。無限哀思傷永別，弘揚遺志慰孤忠。」



智利晚霞



市井萬象

瓦爾帕萊索是智利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，其古城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。圖為七月十日在智利瓦爾帕萊索海岸邊拍攝的晚霞。

新華社